

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的本土探索(1999—2019):功能范式主导的情报学*

谢晓专 周晓英

摘 要 回顾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的进展、成就、特征与趋势,把握学科发展全局,有助于科学规划学科未来发展。文章采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运用“范式理论”和“结构功能理论”,分析1999—2019年间我国公开出版的国家安全情报理论文献,归纳其研究路径、内容、范式、进展、成就、特征与趋势,刻画国家安全情报学术版图。研究发现: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形成了以“情报分析”为中心的系统化的学科理论体系,研究路径呈现“西学东渐”的演变脉络;研究内容可划归为“理论、史论、业务、管理、环境、规范、文化、教育、技术”九维框架;研究范式由“历史范式主导”转向“功能范式主导”,并形成了两大流派;学科建制与《国家情报法》相呼应,呈“三大分支”齐驱之势;研究力量初步形成稳定的学者队伍,主要由四类学科群体构成;学科发展向“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大情报学学科体系迈进,并呈现“法治、回归、融合、扩展、深化”的趋势及特点。表1。参考文献80。

关键词 国家安全情报理论 情报学 功能范式 历史范式

分类号 G250.2

Domestic Explor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Theory (1999–2019): Intelligence Studies Dominated by Functional Paradigm

XIE Xiaozhuan & ZHOU Xiaoy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by reviewing the research progress,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theory in China. From 1949 to 1999, the theoretical process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Studies (NSIS) in China was slow, and the historical paradigm had dominated intelligence studies for half a century. Based on the “paradigm theory” and “structure-function theory”, this paper depicts the academic map of NSIS by summarizing its research focus,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路径研究”(编号:17ZDA291)和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项目“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规格研究”(编号:2020GDLW002)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major project “Research on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ath of Information Work” (No. 17ZDA291)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nd the Advance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Research on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Specificat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Studies” (No. 2020GDLW002).)

通信作者:周晓英,Email:xyz-ruc@qq.com,ORCID:0000-0002-9116-1525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ZHOU Xiaoying, Email:xyz-ruc@qq.com,ORCID:0000-0002-9116-1525)

major achievements, characteristics and major issues through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intelligence literature published from 1999 to 2019.

It finds out that, in the past 20 years, NSIS in China flourished and has roughly presented a pattern of “three pillars” including domestic exploration, foreign research and foreign introduction. Its content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ory, history, business, management, environment, regulation, cultur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and breakthroughs have been made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reas: 1) The discipline takes shape from the fragmented “intelligence theory” to the systematic “intelligence studies”. 2) The research focus has shifted from the “intelligence collecting” to “intelligence analysis”. 3) The emerging branches of NSIS including public security intelligence, emergency intelligence, national defens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telligence, financial intelligence,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and other branches develop vigorously. 4) The theory of intelligence history composed of the contents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technology, activities, institutions, biography of figures” is becoming mature.

NSIS in China has the following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1) The research path presents the general feature of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sciences”. 2)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NSIS, the research based on China’s local experience is relatively few, especially lack of explanatory research, normative research, critical research,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3)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NSI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wo paradigms: historical one and functional one, and has formed “historical school” and “functional school”. 4) In terms of discipline system,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NSIS has initially formed, consisting of three branches including military, public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studies. 5) The research force presents a pattern of multidisciplinary participation, mainly coming from military science, public security scienc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political science, history, public management science, law and other multidisciplinary fields. 6)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discipline is moving towards “serving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with five trend characteristics of “legalization, regression, integration,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1 tab. 80 refs.

KEY WORDS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theory. Intelligence studies. Functional paradigm. Historical paradigm.

1949—1999年间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研究的学理化进程非常缓慢,历史范式主导情报研究的学术版图长达半个世纪^[1]。1998年,我国第一个军事情报学博士学位授权点获批建设^[2],标志着我国国家安全情报学者队伍培养的制度化;1999年,桑松森发表《国家安全与国家安全学》一文^[3],明确提出国家安全学的分支学科应包括国家安全情报学,并于当年出版《国家安全情报学基础》^[4]一书,标志着我国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化思想的萌芽;2005年,公安情报学专业被正式列入教育部高等教育专业目录,开公安情报学学历教育之先河;2019年,我国多所高校

申报的国家安全学二级学科试点获批,国家安全情报被列为重要研究方向;2020年,我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交叉学科”门类,下设“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情报学(Intelligence Studies)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大助推了“功能范式”情报理论研究的崛起,“功能范式”逐渐取代“历史范式”的主导地位,成为情报理论研究的主流,伴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的颁布实施,“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大情报学学科建设思想迅速兴起。大时代需要大变革,大变革迎接大机遇,大

机遇助推大发展,在这种大背景下,回顾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进展,归纳研究内容与范式,梳理发展脉络与特点,揭示现存问题与发展趋势,意义深远。

1 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的范式转换与内容框架

1.1 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范式转换

学界一般将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62年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范式”(paradigm)的系统阐释视为范式理论的源头。在库恩看来,“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5]8}。它涉及由特定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要素所构成的整体以及具体的谜题解答^{[5]147}。此后范式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诺曼·K·邓津(Norman K. Denzin)进一步将范式定义为“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群体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是“用特定的方式(方法论)考察一组问题(认识论)的参考框架(理论、本体论)”^[6]。以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为基础,综合学界对范式的多种理解,笔者认为,“研究范式”是一个立体、多元、多层次的概念系统,至少包含以下四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主体层,是指同一范式的研究者基于共同的信念、价值观、理论背景、研究方法与技术形成“科学共同体”;二是观念层,即拥有共同的理念、信念、观念、研究传统、世界观、伦理/道德观、价值标准与基本态度等,它们为研究工作提供基本的指导思想,规定了共同的理论问题、研究思路与方法,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三是行为规范层,即拥有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具体表现为在共同信念、价值观、态度的指导下形成对研究对象选择、所要解决的问题、概念系统、理论依据、研究准则、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路径、研究框架等的共同约定;四是研

究成果与观点层,即公认的科学成就,在范式指导下形成的理论成果与观点,它们为实践者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按照库恩的观点,当某一学科的科学家群体中大多数人的研究理念、理论、规范、准则、方法等基本一致时,意味着“范式”的形成,标志着“学科的成熟”,而每次范式转换都意味着学科又向前迈进一大步。

参照上述范式理论,纵览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的研究脉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大致历经了三次明显的范式转换。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主要呈现“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道德批判范式”。在国际“冷战”格局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我国实施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等政策,当时的情报理论出版物基于国家安全形势需要,主要着眼于揭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通过间谍情报活动侵略、渗透、颠覆和干预他国主权的活动与本质,对帝国主义间谍活动的“罪恶行径”进行道德批判^[1]。二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道德批判范式”被以客观描述谍报史实为主要特征的“历史范式”所取代,具体表现为从历史视角梳理情报史实,分析历史发展脉络,客观报道世界各国情报机构沿革、人物传记、历史事件(案件/故事)、情报战、情报活动与情报思想等,该范式主导了相当长时期的情报学术版图^[1]。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军事情报学与公安情报学在学科专业建制上取得突破,国家安全情报高等教育迅速发展,情报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逐渐聚焦于情报功能的实现。以情报流程及管理为中心,探讨如何优化和改进情报工作,以更好地为决策提供支持,应对新形势下的安全风险与威胁,成为情报学研究的核心目标与宗旨。“情报学成为国家安全实践的学术补充”^[7],“功能范式主导的情报学”日趋成熟。

1.2 国家安全情报理论成果与内容框架

以国家图书馆书目库、北京大学图书馆书

目库、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图书馆书目库和读秀、超星等文献数据库为数据源,使用“情报”“间谍”“谍报”“隐蔽行动”“秘密战”等检索词,检索1999—2019年间出版的学术专著,检索日期为2020年1月6日,经人工去重和去掉无关文献后,共得到203部书籍(含专著、编著、译著和教材)。论文数据源自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策略为题名含“情报”并且摘要含“军事”或“安全”,或题名含“间谍”或“谍报”或“隐蔽行动”,去重并剔除无关文献后共获得1431篇论文。鉴于公安情报(包括犯罪情报、反恐情报、禁毒情报、边防情报等)有着不同的理论逻辑与演变脉络,另文综述。

梳理上述文献,1999年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平稳转型期(1999—2009年)。世纪之交,“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形成,世界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国际形势日益错综复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8]。以军事情报学博士学位授权点诞生、军事情报学著作公开出版与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思想的提出为标志,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进入新阶段。延续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趋势,研究范式从历史范式主导的谍报论转向功能范式主导的情报学。二是蓬勃发展期(2009—2019年)。我国国家安全体制进入新的调整期,国家安全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并形成综合性、全局性、整体性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一系列国家安全法律陆续修订或颁布实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成果进入速增期,功能范式主导的情报学成型,“情报分析”成为功能范式情报学研究的中心。融合各情报学分支、建立“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学科定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大情报学学科体系建设思想初步形成。

从学术著作来看,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本土探索,梳理我国古代情报思想,研究我国情报史,总结本土情

报实践经验,探讨情报理论、方法、技术、管理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知识体系,此类著作68部(含专著和编著),约占样本总数的33.5%;二是域外研究,以西方情报理论与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以专著或编著方式研究西方大国情报理论与实践的进展和经验,此类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相关著作93部,约占样本总数的45.8%;三是域外引进,以译著或编译方式引进西方经典情报理论成果,译著(含编译作品)42部,约占样本总数的20.7%。在学术论文方面,“本土探索”724篇,“域外研究”707篇,两类成果的数量势均力敌。综合学术著作和论文数据,整体上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成果呈现“三驾马车”的学术图景,“域外研究”占比最高,超过2/5,“本土探索”居中,约占1/3,“域外引进”其后,约占1/5。限于篇幅,本文集中分析“本土探索”进展情况。

笔者通过阅读200余部著作和数以千计的论文,对研究主题进行归纳,发现: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受美国情报理论成果影响颇深,理论知识体系与国际主流情报学内容框架已基本一致,形成了由“基础、历史、业务、管理、规范、环境、文化、教育、技术”构成的“九位一体”的内容架构,具体见表1所示。

2 功能范式主导的情报学:主要进展与成就

“功能范式”这一术语源自“结构功能理论”,结构功能理论(又称“社会系统理论”)把社会看作各种要素(或部分)构成的整体,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具有特定功能与结构的有机整体,各个要素(或部分)都有其特定功用,社会系统藉此得以维持运转^[9]。社会系统如此,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情报系统”亦是如此。因此,本文借用“功能范式”这一术语,旨在描述当前情报理论研究的主流范式,即遵循“环境—功能—结构”的基本逻辑,将国家安全情报系统(意指一切国家安全情报要素

表1 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基本内容框架

研究类型	具体内容
基础	研究情报学基础理论问题,包括情报的定义、范畴、特点、功能;情报与政治、民主、国家安全、决策、政策的关系;情报工作的基本原理、认知基础、技术基础、思想基础;情报学研究对象、内容、范畴、方法、路径等。
历史	研究情报史,包括情报机构史、情报工作(活动/事件)史、情报人物传记、情报思想史、情报技术史、情报战略与体制改革史等。
业务	研究情报业务及其方法、技能与工具,主要以“情报搜集(含人力情报、技术情报、开源情报等)、情报分析(含情报评估、情报预警、情报失误等)、反情报(含战略欺骗)、隐蔽行动、作战情报支援”等为研究重点。
管理	研究情报管理问题,包括宏观层面的国家情报观、国家情报战略、体制机制、机构设置、管理制度、法律政策等;中观层面的人/财/物/信息/技术等资源配置管理以及组织机构管理等;微观层面的情报信息管理(如文档数据管理、信息系统管理等)。
规范	研究情报活动中的法律规制、伦理道德、情报监督控制等问题,重点涉及权利、义务、隐私、保密、职业伦理规范等议题。
环境	研究情报与内外环境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揭示情报现象背后的社会结构根源(如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科技因素)与内在运行机理(如个体特质、心理因素、利益驱动等)。
文化	研究情报文化,探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在情报工作中的反映,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对情报工作的态度 ^[10] ,探究情报文化形成与演变的影响因素等。
教育	研究情报学历教育、职业培训(训练)、人才培养、教学教法等议题。
技术	研究信息技术及其在情报工作中的应用,重点包括情报搜集与感知技术、情报处理技术、情报分析技术、情报传递技术、信息可视化技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

与关系的总和)视为一个有内在结构和功能的有机系统,着眼于情报功能目标的实现,从三个层面研究情报系统与情报现象:一是考察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关系,即研究情报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情报与政治、民主、外交、决策、文化、社会、国家治理等的关系;二是考察情报系统内部的要素构成、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内在结构与功能,如国家情报战略、国家情报体制机制、国家情报组织体系、国家情报法律体系、国家情报观与情报文化等;三是考察情报系统功能组织与业务实现的微观机制,如研究情报管理、情报监督、情报保障、情报支援以及情报搜集、分析、隐蔽行动、反情报等。近年来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成果取得长足进展,功能范式取代了历史范式的主导地位,但目前功能范式研究鲜有讨论情报系统与外部环境变量之

间关系的成果,其进展主要集中于中观和微观层面,重点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突破。

2.1 学科成型:从碎片化的“情报论”到系统化的“情报学”

20 世纪的国家安全情报著述以史实描述为主,谍报故事、人物传记、机构变迁等碎片化史实陈述是情报著述的中心,学理化与学科化进程缓慢^[1]。20 年来,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成果迅速增多,学科化进程飞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为主要分支的国家安全情报学科体系。

自 1999 年开始,军事情报基础理论著作陆续公开出版,构建了以情报“搜集、处理、分析、编写”等业务功能环节为主线,以“基础知识、史论、获取(含搜集、侦察、识别)、处理、分析(含预

测)、编写、情报工作(情报体制、情报人员素养、情报流程等)、信息战/信息化、研究方法”等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情报学科理论体系^[11-15]。尤其2017年以来,贯通中西军事情报学体系的成果面世,系统阐述了军事情报学的发展历程、学科体系、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基本功能、基本分类、情报体制、情报流程、情报搜集(人力情报、技术情报、开源情报)、情报分析(含情报分析流程、产品要求、分析思维、分析失误与应对)、反情报、隐蔽行动等^[16],基本实现了与国际情报学主流理论框架的接轨。

公安情报学于2005年获教育部批准纳入我国高校本科专业目录^[17],随后学术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近15年来教材著作70余部(内部发行占多数),论文数千篇,成为情报学各分支中文献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它在传统的“犯罪情报学”的基础上扩展和深化,形成了以“一条主线(情报周期)、两个重点(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情报理论研究,预防、打击与控制犯罪的情报理论研究)、两个支撑点(情报理论、情报技术)”为基本框架,以“国内安全保卫情报、反恐情报、维稳情报、刑侦情报、经侦情报、禁毒情报、网侦情报、反黑情报”等为主要分支,以公安情报“理论、史论、实务、技术、管理、教育、政策与比较情报学”为主要内容的公安情报学理论体系^[18-19]。

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两大学科制度与理论体系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功能范式主导的情报学学科体系基本成型。以2017年业内学术刊物《情报杂志》组织开展的“情报学一级学科建设”大讨论^[20-22]以及当年10月“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提出的“南京共识”为标志,我国情报学学科体系开始出现转型思想,即重新定位情报学科的发展目标,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树立“大情报观”,推动“军”(军事情报、安全情报等)、“民”(科技情报、社科情报等)情报学的融合,形成“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大情报科学”^[2]。近四年来,立足“大情报观”,建立“服务国家安

全与发展”的情报学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诸多学者发文呼吁推动建立各情报分支融合的大情报学学科体系^[23-30]。不过,关于“融合”的具体方案仍存在争议。一方面,持“融合论”的学者存在 Intelligence 各分支融合论^[23-24]、学科融合论^[25]、范式融合论^[26]、学科间融合论^[31]、交叉学科整合论^[32]、学科群论^[33]等多种主张;另一方面,有学者并不倡导“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学科“融合论”,认为“情报学教育与军事/安全情报教育并不同类或同轨”,进而提出情报学教育“三个面向”和“三个重点方向”,军事/安全情报被排除在外^[34]。

2.2 重心转变:从传统的“获取中心论”转向“分析中心论”

在互联网尚未普及应用的年代,由于信息稀缺,情报工作主要表现为以人力情报为主导、以情报获取为中心任务的基本格局,相应地,情报理论著述多以谍报“获取”为中心,鲜有情报“分析”论著。进入21世纪后,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与信息资源的海量化趋势使情报工作的中心任务逐渐从过去的“获取”向“分析”转移,通过情报分析将碎片化、海量的数据加工成增值的情报产品成为情报工作的重心。在这种背景下,情报分析迅速成为情报学的研究重心。2000年,《军事情报分析与预测》^[35]一书对情报分析与预测的基本原理、方法与特点进行系统探讨,开启了以情报分析为中心的情报理论研究进程。20年来学界发表了一大批情报分析论文,主要探讨情报分析理论(如相似原理、相关原理、信息构建理论、信息场理论、结构洞理论、系统理论、认知理论等)、情报分析方法与技术(思维方法、定性方法、定量方法、数据挖掘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可视化技术等),以及情报分析主体的认知心理特征及其控制机制等。尤其是2009年以来,情报分析与预警方面的研究成果激增,内容涉及情报分析理论、情报分析方法、情报分析模型、情报分析案例、战略突袭预警等

诸多方面^[36-43],情报分析成为情报学研究领域名副其实的“中心”。其中,战略情报分析成为关注的重点,研究内容广泛涉及战略情报的历史演进与作用、内容体系、能力构成、博弈互动、情报需求、问题与挑战、情报获取、情报分析、预警情报生成与实施、战略情报体系转型等^[44-47]。目前,以情报分析“基本原理、认知心理、分析方法、分析技术、分析工具、分析机制”等为主要内容的“情报分析学”已见雏形,伴随着认知科学、心理学、行为科学、信息技术等的发展进步而不断更新换代,并向“分析理论、认知心理、方法技术、产品与用户、制度与机制”等方向深化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分析理论维,研究情报分析的基本原理、内在机制、影响因素及其与决策的关系等;二是认知心理维,研究认知、思维、心理等对情报分析的影响,从认知与心理视角探讨情报分析质量控制策略;三是方法技术维,已形成“基于认知维的结构化分析方法”和“基于技术维的数据分析技术”两大情报分析流派;四是产品与用户维,研究情报分析产品的制作、表达、内容与形式标准、质量控制措施以及用户情报需求与反馈等;五是制度与机制维,主要探讨情报分析制度与机制建设,以改进情报分析质量。

2.3 版图扩张:新兴情报分支学科的理论研究蓬勃发展

在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两大建制学科蓬勃发展的同时,一些新兴分支领域成为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繁荣的重要增长点。一是应急情报研究成为热点。自2003年SARS危机爆发以来,应急情报理论研究成果迅速增多,重点论及应急管理情报体系、系统建设、知识库建设、情报需求、情报融合、情报研判、情报服务、协同机制、决策机制、响应机制、管理模式、人才培养、资源保障等^[48-50],初步建立了应急管理情报理论体系。二是国防科技情报学成为重要增长点。一方面从学科建设视角明确提出国防科技情报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析建立国防科技

情报学的重要意义,从学科功能、学科定位、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重点、发展趋势、学科体系、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维度明确了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51-53];另一方面从业务角度深入探讨国防科技信息工作转型、情报工作基本理论方法、国防科技信息决策情报服务理论及其知识化与智库化、国防科技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模式等^[54],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防科技情报理论体系。三是金融情报学初现端倪,提出了“金融情报学”概念,进而围绕金融情报搜集分析、编撰与评估、预测与预警、报送与传递,金融情报人员的素质、基本条件与定位,金融情报机构及其与决策机构的关系,金融反情报手段等基本问题,建构金融情报学基本框架^[55]。丁晓蔚和苏新宁旗帜鲜明地指出“金融情报学是情报学的重要分支”^[56]。四是开源情报研究进一步升温,重点围绕开源情报的类型、特点、价值与来源,开源情报搜集/处理/分析方法、技术与工具,开源情报管理以及开源情报在军事、执法、安全、商业等各具体领域的应用开展研究,开源情报理论初成体系。五是上升到“决策情报学”的高度系统阐释情报服务决策的本质,深入剖析情报获取、情报甄别、情报分析、决策流程与途径、决策动力机制与模式、决策公理与陷阱,并探讨了决策情报学在各领域的应用^[57]。六是除了上述新兴分支外,传统的隐蔽战争亦开始出现系统化的理论成果,如围绕现代隐蔽战争的内涵、功能、特点、原则底线,中外隐蔽战争的历史演变,隐蔽战争的思想发展脉络、隐蔽战争系统结构与功能、隐蔽战术与战略、秘密防御等议题建构隐蔽战争学体系^[58],大大丰富了我国情报学知识体系。

2.4 史论成熟:从“讲故事”转向“以史鉴今”的功能范式

尽管我国情报学研究重心从历史范式转向功能范式,但历史范式的情报史成果依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建立了以“思想史、技术史、活动史、机构史、人物传记”等为基本内容,由“古代

情报史”与“近现代情报史”两大体系构成的情报史学,并呈现“领域细分”和“综合集成”两大发展趋势。具体而言,有以下特点。一是中国古代情报史成果颇丰。大量论文对《孙子兵法》《管子》《六韬》《吕氏春秋》《吴子》《司马法》《鬼谷子》等古籍的情报思想进行探讨,如张晓军立足“己、彼、天、地”等情报要素,从情报认识论、搜集、分析、应用等维度解读《武经七书》情报思想,突破情报史实的藩篱,转向深层次的情报思想史^[59]。春秋战国^[60-61]、两宋时期^[62-63]的间谍活动成为古代情报活动史研究的重点。2010年以来,一批古代情报史著作面世,重点探讨先秦、楚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朝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情报活动、情报思想和理论^[64-66],标志着中国古代情报史论体系日趋成熟。二是中国近现代情报史崛起。近现代情报史主要聚焦于近现代情报人物传记以及情报机构与活动史,重点对国共两党隐蔽战线历史与主要人物进行研究^[67-70],其中部分著述开始改变“述而不论”的传统,深入探讨情报史背后的规律与特点,在系统性和学理性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三是情报技术史取得突破性进展,较为系统地回答了二战后情报侦察技术发展的背景、动力、脉络与趋势,以及情报侦察技术发展对情报观、战略情报理论、战场情报准备理论、战场情报支援理论、军事情报转型理论、作战方式与战争形态变革的影响,提出情报侦察技术的发展和突破是军事情报工作变革的决定性因素的论断^[71]。四是开始出现综合性的情报史著作。此类著作纵论古今中外情报史和情报思想史,形成宏大、系统的情报史论^[72-73],这意味着情报史研究在向断代史、人物史、机构史、国别史、情报技术史、情报思想史等领域细分演进和纵深发展的同时,“情报综合史”亦成为重要趋势,“情报史学”已见雏形。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情报史论成果受情报功能范式的影响,其基本理念、研究视角与宗旨发生了转变,大部分情报史著述不再仅仅着眼于“历史揭秘”“披露真相”以及客观讲述“历史故事”,而

是更多地从功能视角,挖掘情报工作发展的历史规律,揭示其在政治、军事、外交等决策中的作用,探讨其对当下与未来情报工作的启示与教训。正如高金虎教授在《中西情报史》中所言:“情报史研究旨在总结各国情报工作发展中的经验教训”^{[72]30},“藉此指导情报工作实践。”^{[72]1}

3 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特征与发展趋势

20年来,多学科学者参与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形成了稳定的学者群体,传统的“以译著为主导,以史实为中心,以国外成果引进为主要路径”的情报理论研究模式向“国外引进与本土创新并重,事实描述与理论探索同行”模式转变。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为指引,推动各行业情报学分支融合,建立统一的“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体系,成为我国情报学发展的战略选择与方向。具体说来,1999—2019年间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的本土探索主要有以下突出特点。

3.1 研究路径:西学东渐,特色渐显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的研究历程,大致历经了“道德批判→客观引进→吸收学习→模仿创造→自主创新”的过程,总体呈现“域外研究、本土探索、域外引进”三大路径并驾齐驱的格局。从著作数量上看,域外研究>本土探索>域外引进,说明我国以翻译引进为主的情报学术研究模式已成为历史,正在向“模仿创造”和“自主创新”方向迈进。这一演变脉络具体表现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因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安全形势,研究成果主要针对西方情报工作开展道德与意识形态批判;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开始以译著、编译等方式引进世界大国的情报史论成果;21世纪以来开始有组织地翻译西方功能范式的情报理论成果,以求“西学中用”;近年开始进入到“中西并重”阶段,以“西学”为基础建构情报学科理论体系,并根据本土实际情况,开展模仿创造和自主创新。

总体上看,由于保密文化以及情报神秘化等诸多因素制约,本土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古代、近现代情报史与情报思想史,以及情报分析理论,真正扎根当代本土情报经验,挖掘本土情报实践规律,进而上升为情报理论的著述尚不多见,尚未形成我国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概言之,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主要呈现“西学东渐”的总特征,经历了“直接引进西方著述为主”到“域外引进和本土探索同盛”的转变过程。

3.2 研究内容:维度缺失,框架渐成

在西方主流情报学界,情报学是通过借鉴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心理学等学科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密切关注情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74]。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治学者斯塔福德·T·托马斯(S. T. Thomas)将美国情报理论研究归为“描述研究”“政策研究”“规范研究”“解释研究”四种类型和“历史”“功能”“组织”“政治”四大范式^[75];90年代,韦斯利·沃克(Wesley Wark)将情报学研究内容归为“情报研究”“历史”“定义”“方法论”“回忆录”“公民权利”“调查性报道”“流行文化”八个方面^[76];2016年,英国彼得·吉尔(Peter Gill)等学者提出情报学研究四要素框架——研究/历史—定义/方法—组织/功能—治理/政策^[74]。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域外研究和引进成果占比较大,上述研究维度与内容在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成果中得到了全面的反映,基本实现了与国际主流情报学的接轨,形成了由“理论、史论、业务、管理、规范、环境、文化、教育、技术”等九个方面构成的内容框架。但也应看到,与西方情报学研究范畴相比,立足我国本土经验的原创性研究成果相对单一,主要聚焦于“基础”“史论”“业务”“管理”“技术”“教育”等六个方面,解释性研究、规范性研究、批判性研究、政治与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较少,对情报与政治、情报与公民权利、情报与外交政策、情报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以及情报监督与问责、情报文

化与伦理规范等方面的研究严重不足,后者恰恰是情报学科理论升华和成熟的重要标志,这表明我国情报研究离成熟的学科还有相当距离。

3.3 研究范式:范式变迁,流派渐立

国际情报学界已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政治学派”(政治学学者是情报学研究的主力军)和以英国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历史学学者是情报学研究的主力军)。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主要表现为历史与功能两大范式,并正在形成“历史学派”与“功能学派”。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后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主要以“历史范式”为主导,学者群体以历史学、政治学学者为主,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谍报机构史、谍报活动(事件)史、谍报人物传记、谍报思想史、历史谍报故事等,成果类型主要表现为“历史事实”梳理与描述性研究。历史范式延续至今,仍在国家安全情报理论成果中占据重要位置。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向“功能范式”转变,尤其20余年来,功能范式著述成果占绝大多数,国家情报系统中以情报搜集、情报分析、情报失误(失察)、情报预警、反情报、隐蔽行动、作战情报支援、情报监督管理、情报教育培训等理论、方法、技术、策略、体制、机制与制度的功能范式成果迅速增多,取代了历史范式的主导地位,早期“以人力情报(谍报)为主要来源,以情报获取为中心任务”的情报历史范式研究逐渐向社会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基于多源数据,以情报分析为中心”的情报功能范式研究转变。当下专门从事情报学研究的学者绝大部分着眼于功能研究,研究视野局限于国家情报系统内部组织功能实现的中微观机制,而对于国家情报系统与外部环境(例如政治体制、国家决策文化、外交战略、国家现代化治理、媒体与科技等环境要素)的互动关系鲜有讨论。年轻一代学者关注情报史的也越来越少,相当部分的情报史论成果来自情报学科之外的历史与政治学科。因历史学派与功能学派的学

者来自不同的学科,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研究视角、成果刊发载体等均有较大区别,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建立对话沟通的机制,相互之间互不关注,甚至在文献援引方面都鲜有交融,形成相互孤立的两大流派。

3.4 学科建制:三分天下,体系渐全

独立的学科建制为情报学的发展与建设提供了根本保障。我国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两大分支先后纳入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并在理论层面呈现向国家安全情报学融合扩展的趋势。军事情报学为二级学科建制,根据公开资料,1986年前后,我国招收第一批军事情报学硕士研究生,1998年第一个军事情报学博士学位获批^[2],公安情报学于2005年纳入教育部高等教育专业目录。2019年我国一批高校获批国家安全学二级学科(试点)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2020年国家安全学增设为一级学科,部分高校将国家安全情报列为国家安全学硕士点与博士点的研究方向。如此,初步形成由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国家安全情报学三大分支构成的国家安全情报学科体系,这一“三分天下”的学科架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关于“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情报机构、军队情报机构”统称“国家情报工作机构”的界定完全一致。这一学科建制架构基本实现了与国际情报学界主流的接轨,例如美国安全情报学亦由军事情报(含情报通论、战略情报、信号/地理空间情报等)、执法与国土安全情报(含地理空间情报、执法情报分析)与国家安全情报等专业或专业方向构成^{[31][22]}。随着三大分支学科建制化,我国情报人才培养机制亦逐渐健全,目前军事情报学、国家安全情报学已经形成职业培训、硕士、博士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公安情报学已形成职业培训、本科、硕士、博士(方向)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硕士、博士层次学历教育制度的建立为情报学者培养与师资队伍建设和提供了强有力的“造血”功能,为情报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5 研究力量:四类群体,协力共担

随着情报学学科制度的建立以及专门教学研究机构产生,从事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的学者队伍逐渐发展壮大,根据所属学科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军事情报理论研究者,主要来自军事院校;二是公安情报理论研究者,主要来自警察院校;三是图书情报理论研究者,主要来自地方高校的信息管理学院;四是政治学、历史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主要来自地方院校的历史文化、国际关系、刑事司法、公共管理等院系。尽管国家安全情报领域群体规模不大,但已初步形成稳定的、梯队结构合理的国家安全情报理论学者队伍,尤其是70—8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学者已逐渐成长为国家安全情报学领域的中坚力量。

在上述四类学者群体中,军事情报学者、公安情报学者占多数,他们多从事情报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一般将情报理论研究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从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文献看,这两类群体主要围绕军事、公安等行业领域的现实需求,以高质量的情报产品生产为目标导向,以情报工作流程为基本框架,以“情报搜集、情报分析、反情报、隐蔽行动、情报监督、情报法制”等为主要内容,从情报支持决策与行动的功能视角,推动行业情报学建设与发展。

科技情报、图书情报领域的部分学者是推动国家安全情报理论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近年来,部分图情学者倡导“信息范式与情报范式融合”“军民融合”的大情报学学科体系建设理念,支持建立“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情报科学,为推动 Intelligence Studies 在地方高校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图书情报领域还涌现出一批以国家安全情报、反恐怖情报、应急情报等为研究兴趣的新生代学者,成为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的有生力量。

第四类国家安全情报理论学者来自历史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刑事司法、安全科学与工程等多学科领域,从各自学科视角围绕战略情报、西方国家隐蔽行动历史、外国情报评估、

中国近现代情报史、情报监控法律伦理、世界各
大国国家安全与情报预警机制、应急情报理论、
安全情报学等开展专题性研究,研究议题相对
分散。多学科学者的参与,开拓了情报理论研
究的视野,拓宽了情报理论研究的方法和路径,
大大丰富了我国情报理论研究成果。不过,后
两类学者群体大多并非专门从事国家安全情报
教学研究工作,他们或因阶段性的课题项目所
需开展安全情报理论研究,或将安全情报作为
众多研究兴趣中的一个,属于非“全职”的国家
安全情报理论研究者。

3.6 发展趋势:五大特征,趋势渐明

2017年,以《国家情报法》和情报学界“南
京共识”的颁布为标志,我国功能范式的情报理
论研究进入以“法治”“回归”“融合”“扩展”“深
化”为主要特征的“大情报学科”建设新阶段。

一是法治,以“授权”与“规制”为中心开展
情报法治研究进路。2017年6月,我国《国家情
报法》颁布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情报工作从幕
后走向前台,情报法制建设与理论研究随之进
入新阶段,可以预测,“情报授权”与“情报规制”
将成为我国未来情报学重要研究领域。

二是回归,进一步确立“服务国家安全与发
展”的学科定位以及“耳目、尖兵、参谋、智库”的
情报职能定位。20世纪80年代,我国科技情报
学界一般将军事情报学列为情报学的分支^[77-80]。
随着90年代信息浪潮兴起,Intelligence范式和
Information范式分野逐渐形成,然而由于地方高
校Intelligence研究群体规模小,Intelligence理论
发展式微。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囿于行业
系统,相对封闭,未能形成开放的学术环境。直
至2017年我国《国家情报法》出台,学界才开始
广泛积极反思情报学定位,倡导以总体国家安
全观为指导,重新认识情报学的地位与作用,重
新规划情报学的发展,“为国家安全与发展之
国策”培养情报人才^[25],并确立了“面向国家
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学科定位^[2]。2019年,
《情报杂志》将办刊宗旨调整为

“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推动国家安全情报学理
论体系构建”。这些均表明情报学界开始厘清
概念,破除迷雾,回归情报本位。

三是融合,建立跨界融合的大情报学学科
体系。近年来,我国情报学界以“总体国家安
全观”为指导思想,开始考虑融合各情报学分支,
探讨建立“大情报学学科”。《情报杂志》自
2014年发起“华山情报论坛”,旨在“为中国情
报界搭建一个学科交融的大平台”,并组织发起
“情报学一级学科”大探讨,倡导建立统一的“服
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学科体系;2017年
首届“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倡导在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
着眼于国家发展与安全,推动科技情报、社科
情报、军事情报、安全情报融合形成大情报科
学^[2];2018年,包昌火研究员撰文提出我国情
报学学科体系由“科技情报学、竞争情报学、军
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国家安全情报学”五大
分支构成^[24];近三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申报公告”将国家安全情报学学科与事业、国
家安全情报学理论与应用、面向国家安全决策
的情报服务创新、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制度创新、
国家安全情报态势感知技术与应用等列入申报
指南;“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新理论”“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情报学发展”先后被评为
2019、2020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
点”之一。这些标志着我国建立各情报分支“融
合”的“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情报学学科体系”
思想已成为部分学者的共识。可以预见,随着
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变化、国家安全体制改革与
战略部署调整以及国家安全学的发展,会有越
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公共
管理、历史、法学、公安学等学科的学者关注
并参与到国家安全情报理论研究中来,推动更为
广泛的学科间的交叉融合。

四是扩展,即研究领域向各行业分支扩展
延伸。我国国家安全情报学理论研究除了传统
的军事情报学获得蓬勃发展外,还突出地表现
为公安情报学、应急情报学、国防科技情报学、

金融情报学、网络情报学等成为我国情报理论研究新的增长点。随着各行各业对情报工作的日趋重视,情报学将向各行业和各领域渗透扩张,不断产生更多的与特定行业相结合的情报理论研究分支领域,这既是由情报本身的特质与重要性所决定的,亦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应对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现实要求。

五是深化,在学科分支不断扩展延伸的同时,紧紧围绕重点领域深化发展。功能范式的情报学研究向情报理论、情报史、情报战略、情

报体制、情报监督、情报管理、情报政策、情报搜集、情报分析、情报失误、隐蔽行动、反情报、情报教育等重点领域纵深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的情报理论体系。此外,从宏观维度考察国家情报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从中观维度考察我国国家情报监督与治理体系、国家情报文化与伦理系统,运用规范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开展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亦将逐步受到重视,并成为国家安全情报领域的理论增长点。

参考文献

- [1] 谢晓专,高金虎. 中国国家安全情报学术史(1949—1999年):历史范式主导的情报论[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4):24-31. (Xie Xiaozhuan, Gao Jinhu. Hist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studies in China (1949-1999): intelligence theory dominated by historical paradigm[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2020(4):24-31.)
- [2]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 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J]. 情报学报,2017(11):1209-1210.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China Society for Social Sciences Information. The Nanjing consensus o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work[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17(11):1209-1210.)
- [3] 桑松森. 国家安全与国家安全学[J]. 国家安全通讯,1999(2):31. (Sang Songsen.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science[J]. National Security Bulletin, 1999(2):31.)
- [4] 刘跃进. 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探索历程[J]. 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20(1):113-119. (Liu Yuej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of national security[J]. Journal of Railway Police College, 2010, 20(1):113-119.)
- [5]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第四版. 金吾伦,胡新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 4th ed. Jin Wulun, Hu Xinhe, 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 [6] 诺曼·K·邓津,伊冯娜·林肯. 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第1卷[M]. 风笑天,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23-24. (Denzin N K, Lincoln Y 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first volume[M]. Feng Xiaotian, trans.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23-24.)
- [7] Marrin S. Improving intelligence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J].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2016, 31(2):266-279.
- [8]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07-10-15) [2020-04-18]. <http://www.scopssr.gov.cn/zlzx/>

- ddh/ddh17/ddh170/201811/t20181121_329178. html. (Hu Jintao. Hold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ive for new victories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report to the 17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EB/OL]. (2007-10-15)[2020-04-18]. http://www.scoprs.gov.cn/zlzx/ddh/ddh17/ddh170/201811/t20181121_329178. html.)
- [9] Parsons T.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 [10] 高金虎. 试论情报文化对情报工作的影响[J].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10(12): 77. (Gao Jinhu. The influence of intelligence culture on intelligence work[J]. Journal of Jiangnan Social University, 2010(12): 77.)
- [11] 阎晋中. 军事情报学[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9. (Yan Jinzhong. Military intelligence science[M]. Beijing: Current Affairs Press, 1999.)
- [12] 张晓军. 军事情报学[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1. (Zhang Xiaojun. Military intelligence science[M]. Beijing: Military Science Press, 2001.)
- [13] 李耐国. 军事情报研究[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1. (Li Naiguo. Research on military intelligence [M]. Beijing: Military Science Press, 2001.)
- [14] 陈龙驹, 赵胜萍. 军事情报学[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5. (Chen Longju, Zhao Shengping. Military intelligence science[M]. Beijing: Military Science Press, 2005.)
- [15] 肖占中, 宋明武. 军事情报学概论[M]. 北京: 海潮出版社, 2006. (Xiao Zhanzhong, Song Mingwu. Introduction to military intelligence science[M]. Beijing: Haichao Press, 2006.)
- [16] 高金虎. 军事情报学[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Gao Jinhu. Military intelligence science[M].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ress, 2017.)
- [17] 教育部. 关于公布2004年度经教育部备案或批准设置的高等学校本专科专业名单的通知(教高函[2005]7号)[Z]. 2005年3月4日.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tice on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list of specialt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gistered or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04[Z]. March 4, 2005.)
- [18] 谢晓专. 公安情报学学科体系的构建[J]. 情报资料工作, 2012(4): 17-21. (Xie Xiaozhua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ecurity information science discipline system[J].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ervices, 2012(4): 17-21.)
- [19] 谢晓专. 公安情报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论纲[J]. 情报科学, 2013, 31(9): 128-132. (Xie Xiaozhuan. On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contents of public security intelligence[J]. Information Science, 2013, 31(9): 128-132.)
- [20] 黄长著. 关于建立情报学一级学科的考虑[J]. 情报杂志, 2017, 36(5): 6-8. (Huang Changzhu. Considerations on establishing the first-level discipline of information science[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17, 36(5): 6-8.)
- [21] 袁勤俭. 关于设立情报学一级学科之我见[J]. 情报杂志, 2017, 36(6): 8-9. (Yuan Qinjian. My opin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level discipline of intelligence science[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17, 36(6): 8-9.)
- [22] 谢晓专. 关于设立“情报学一级学科”之浅见[J]. 情报杂志, 2017, 36(7): 1-2, 15. (Xie Xiaozhua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first-level discipline” for intelligence science [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17, 36

- (7):1-2,15.)
- [23] 高金虎. 从“国家情报法”谈中国情报学的重构[J]. 情报杂志,2017,36(6):1-7. (Gao Jinhu. On the promulgation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ac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igence stud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2017,36(6):1-7.)
- [24] 包昌火,金学慧,张婧,等. 论中国情报学学科体系的构建[J]. 情报杂志,2018,37(10):1-11,41. (Bao Changhuo, Jin Xuehui, Zhang Jing, et al.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system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in China [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2018,37(10):1-11,41.)
- [25] 苏新宁. 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学科崛起之思考[J]. 情报学报,2018(5):453. (Su Xinning. The rise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in the age of big data[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18(5):453.)
- [26] 周晓英,陈燕方. 中国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冲突与思考[J]. 公安学研究,2019,2(2):27-44,123. (Zhou Xiaoying, Chen Yanfang. Conflict in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some reflections[J]. Journal of Public Security Science,2019,2(2):27-44,123.)
- [27] 申华. 军事情报学视野下的中国情报学融合发展研究[J]. 情报杂志,2019,38(9):24-29. (Shen Hua. A study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 intelligence discip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scipline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2019,38(9):24-29.)
- [28] 杨建林,苗蕾. 情报学学科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发展方向[J]. 科技情报研究,2019,1(1):29-50. (Yang Jianlin, Miao Lei. Major problems i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discipline[J]. Scientific Information Research,2019,1(1):29-50.)
- [29] 李广建. 构建中国特色的情报学[J]. 图书情报研究,2020,13(1):3-4,13. (Li Guangjian. Constructing information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Library & Information Studies,2020,13(1):3-4,13.)
- [30] 赵冰峰. 情报学:服务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的现代情报理论[M].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8. (Zhao Bingfeng. Modern intelligence theory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M]. Beijing: Gold Wall Press,2018.)
- [31] 谢晓专.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我国情报学发展的困境与转向[J]. 公安学研究,2019,2(4):20-45. (Xie Xiaozhuan.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an analysis of China's intelligence studies based on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J]. Journal of Public Security Science,2019,2(4):20-45.)
- [32] 杨建林. 情报学学科体系的再认识[J]. 现代情报,2020,40(1):4-13,23. (Yang Jianlin. Re-thinking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information science[J]. Journal of Modern Information,2020,40(1):4-13,23.)
- [33] 肖勇. 论基于“三大研究范式”之上的当代中国情报学学科体系与学科群体系构建[J]. 情报学报,2017,36(9):894-907. (Xiao Yong. Establishment of subject system and discipline cluster system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information science based on the three research paradigms [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2017,36(9):894-907.)
- [34] 柯平. 情报学教育向何处去?[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43(6):1-9. (Ke Ping. Where does information studies education go?[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2020,43(6):1-9.)
- [35] 翟晓敏,杨寿青. 军事情报分析与预测[M].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Zhai Xiaomin, Yang Shou-

- qing.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alysis and prediction[M]. Beijing: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36] 钱军. 情报分析的认知理论与方法[M]. 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09. (Qian Jun. Cognitive theory and methods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M]. Shenzhen: Shenzhen Press Group Press, 2009.)
- [37] 高庆德. 军事情报分析模型构建[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0. (Gao Qingde. Construction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alysis model[M]. Beijing: Military Science Press, 2010.)
- [38] 杨寿青. 情报分析主要方法[M].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2014. (Yang Shouqing. Main methods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M]. Beijing: Yi Wen Publishing Military, 2014.)
- [39] 季正明, 马晓娟. 情报分析案例选[M].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6. (Ji Zhengming, Ma Xiaojuan. Intelligence analysis cases[M]. Beijing: Gold Wall Press, 2016.)
- [40] 严贝妮. 情报分析中的个体认知偏差及其干预策略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Yan Beini. Research on individual cognitive bias and its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in intelligence analysis[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7.)
- [41] 汪明敏. 反恐预警分析研究[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6. (Wang Mingmin.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early warning against terrorism[M]. Beijing: Military Science Press, 2016.)
- [42] 李景龙. 情报分析:理论、方法与案例[M].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7. (Li Jinglong. Intelligence analysis: theories, methods and cases[M]. Beijing: Current Affairs Press, 2017.)
- [43] 高金虎, 张魁. 情报分析方法论[M].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7. (Gao Jinhu, Zhang Kui. Intelligence analysis methodology[M]. Beijing: Gold Wall Press, 2017.)
- [44] 牛新春. 战略情报分析:方法与实践[M].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6. (Niu Xinchun. Strategic intelligence analysis: methods and practices[M]. Beijing: Current Affairs Press, 2016.)
- [45] 张长军. 战略突袭预警研究[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0. (Zhang Changjun. Research on early warning of strategic surprise[M]. Beijing: Military Science Press, 2010.)
- [46] 刘强. 战略预警视野下的战略情报工作:边缘理论与历史实践的解析[M].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4. (Liu Qiang. Strategic intelligence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early warning: an analysis of edge theory and historical practice[M]. Beijing: Current Affairs Press, 2014.)
- [47] 李冬伟, 唐永胜. 大战略情报析论[M].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9. (Li Dongwei, Tang Yongsheng. Analysis on grand strategic intelligence[M]. Beijing: Current Affairs Press, 2019.)
- [48] 苏新宁. 应急响应情报体系:理论、技术与实践[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9. (Su Xinning. Emergency response intelligence systems: theory, technology, and practice[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9.)
- [49] 郭骅. 现代性背景下的应急管理情报体系[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20. (Guo Hua. Emergency management intelligence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ty[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20.)
- [50] 姚乐野. 跨学科综合集成的应急管理情报体系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Yao Leye. Research o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ed emergency management intelligence system[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9.)
- [51] 祁长松. 试论国防科技情报学的学科建设[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4(3): 225–228. (Qi Changsong. On the

- subject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science[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2004(3): 225-228.)
- [52] 符福珏. 国防科技情报学学科定位与发展前景[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8(3): 321-325. (Fu Fuhuan.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defens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science[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2008(3): 321-325.)
- [53] 汤珊红. 国防科技情报学建设思考[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9, 32(1): 14-17. (Tang Shanhong. Think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efens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science[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2009, 32(1): 14-17.)
- [54] 宫宏光, 常金玲, 汤珊红. 国防科技情报创新理论与方法[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8. (Gong Hongguang, Chang Jinling, Tang Shanhong.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defens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innovation[M]. Beijing: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2018.)
- [55] 王幸平. 金融情报学[M].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8. (Wang Xingping. Financial intelligence studies[M]. Beijing: Gold Wall Press, 2018.)
- [56] 丁晓蔚, 苏新宁. 金融情报学: 情报学的重要分支学科[J]. 情报学报, 2020, 39(2): 158-170. (Ding Xiaowei, Su Xinning. Financial informatics: an important subdiscipline of information science[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20, 39(2): 158-170.)
- [57] 刘海桑. 决策情报学——从概念框架到应用[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8. (Liu Haisang. Decision intelligence studies: from conceptual framework to application[M].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2018.)
- [58] 何由. 隐蔽战争[M]. 北京: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13. (He You. Hidden war[M]. Beijing: China Market Press, 2013.)
- [59] 张晓军. 《武经七书》军事情报思想研究[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1. (Zhang Xiaojun.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of the *Seven military classics*[M]. Beijing: Military Science Press, 2001.)
- [60] 易泽阳. 春秋战国时期间谍活动探微[J]. 军事历史, 2009(2): 31-35. (Yi Zeyang. On espionage activitie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 ancient China[J]. Military History, 2009(2): 31-35.)
- [61] 储道立, 熊剑平. 苏秦间谍案述评[J]. 军事历史研究, 2003(4): 117-123. (Chu Daoli, Xiong Jianping. A review of Su Qin spy case[J]. Military History Studies, 2003(4): 117-123.)
- [62] 张丽娜. 宋代间谍情报活动初探[D]. 厦门: 厦门大学, 2009. (Zhang Lina. A study of spy activities in Song Dynasty[D].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2009.)
- [63] 舒仁辉, 范晓燕. 试论两宋时期的间谍问题[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5): 101-106. (Shu Renhui, Fan Xiaoyan. The issue of espionage during the two Song Dynasties[J]. Journal of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7(5): 101-106.)
- [64] 高艺. 先秦军事情报思想[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Gao Yi. Pre-Qin military intelligence thought [M].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ress, 2017.)
- [65] 储道立, 熊剑平. 中国古代情报史论稿[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Chu Daoli, Xiong Jianping. On the history of intelligence in ancient China[M]. Yinchuan: Ning Xia People's Press, 2010.)

- [66] 熊剑平,储道立. 中国古代情报史[M].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6. (Xiong Jianping, Chu Daoli.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intelligence[M]. Beijing: Gold Wall Press, 2016.)
- [67] 游国立. 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研究[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You Guoli. Research on the hidden fro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M]. Beij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Press, 2006.)
- [68] 马振铎. 国民党特务活动史[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 (Ma Zhendu. History of Kuomintang secret service activities[M]. Beijing: Jiuzhou Press, 2008.)
- [69] 本书编委会. 隐蔽战线春秋书系: 传记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 (Editorial board of this book. Covert battle lines: biographies[M]. Beij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Press, 2018.)
- [70] 熊向晖.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修订版)[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Xiong Xianghui. My career in intelligence and diplomacy[M]. Beijing: Citic Press, 2019.)
- [71] 孙建民. 战后情报侦察技术发展史研究[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 (Sun Jianmi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intelligence and reconnaissance technology after the war[M]. Beijing: Military Science Press, 2008.)
- [72] 高金虎. 中西情报史[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Gao Jinhu.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lligence[M].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ress, 2017.)
- [73] 高金虎,吴晓晓. 中西情报思想史[M].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6. (Gao Jinhu, Wu Xiaoxiao. Chinese and foreign intellectual history[M]. Beijing: Gold Wall Press, 2016.)
- [74] Gill P, Phythian M. What is intelligence studie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Public Affairs, 2016(18):1, 5–19.
- [75] Thomas S T. Assessing current intelligence stud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 Intelligence, 1988(2): 217–244.
- [76] Wark W K. Introduction: the study of espionage: past, present, future?[J].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1993, 8(3):1–13.
- [77] 黄立军. 关于情报学体系结构的研究[J]. 情报杂志, 1988(2):11. (Huang Lijun. Research on the architecture of information science[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1988(2):11.)
- [78] 王昌亚,胡昌平. 试论当代情报学理论研究[J]. 情报学报, 1988(3):176. (Wang Changya, Hu Changping.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information science[J].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1988(3):176.)
- [79] 卢绍君. 论情报学表层结构[J]. 情报理论与实践, 1988(4):11. (Lu Shaojun. On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information science[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1988(4):11.)
- [80] 张永东. 情报科学的体系构成和门类划分[J]. 情报学刊, 1987(5):12. (Zhang Yongdong. The system composition and category divis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1987(5):12.)

谢晓专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 100038。

周晓英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收稿日期:2020-07-06;修回日期:2020-11-04)